



# 殷墟青铜器研究

李济 著

殷商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 殷墟青铜器研究

李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青铜器研究/李济著.—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540-5

I. ①殷… II. ①李… III. ①商代铜器-研究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025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

殷墟青铜器研究

李 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6 插页 4 字数 498,000

2017 年 12 月第 2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40-5/K·2642

定价 88.00 元



青铜四足器（鹿鼎）



青铜四足器（牛鼎）



青铜大鼎



青铜鬲



青铜大罍



青铜爵



青铜觚



青铜方彝

##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是李济先生研究殷墟青铜器的论著汇集。李济先生曾就殷墟出土的青铜觚形器、青铜爵形器、青铜斝形器、青铜鼎形器、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等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分别发表在1964年、1966年、1968年、1970年、1972年于台湾出版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各集；另外一篇《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这六篇著述，是李济先生关于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2006年，该六篇报告以“殷墟铜器研究”为专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五卷本《李济文集》第四卷。

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安阳出土的殷墟青铜器不仅是殷商文化的最高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器物。诚如李济先生所说：“殷商时代实乃代表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一座巅峰。”“属于这一时期的安阳出土之青铜器，以作供奉用的礼器最多；这组器物已引起了中外收藏家八百余年的特别注意。这些宗庙重器，照最近研究的结论说，证实了在三千余年以前，华北一带的青铜业不但在技术的造诣方面超越了同时的地中海区域，它们所表现的形制和装饰，更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宗教情绪、社会组织及物质环境之一般。”

“研究殷商时代青铜礼器所得的更重要的一项结论，自然是这些器物所显示的历史意义。就它们的形制与文饰看，它们代表远东地区很久远的传统。差不多所有礼器的形制都承袭了华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或木器的形制；装饰这些礼器的花纹，尤其表现十足的东方色彩和构想。”（《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并由此窥测中国文化的渊源及其所代表之精神》，载《李济文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572—573 页)

对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李济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收入本书的六篇报告，即是作者依据殷墟青铜器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与所在地层及其他地层的相对位置，与同时同一地层或墓葬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关系，以及这些青铜器物的质料、作法、形制、文饰等田野考古记录和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理论及化学分析、金相测定等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李济先生的研究，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器物学研究与传统古器物学研究的界限，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可以说，他的研究，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 1928 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精深，从严谨的论证中可以体会到一代考古学大师在学术研究领域深厚的专业学养、睿智的探索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些论著，除了在史语所的刊物上发表和收入《李济文集》外，迄今尚未单行出版。为满足研究工作者和对此有兴趣的读者的需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本书定书名为《殷墟青铜器研究》，予以单行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以 2006 年版《李济文集》为底本。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对全书作了仔细校订；出版前，对全书的文字、注释、图表等也作了规范处理。

## 目录

### 本书出版说明 / 1

### 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花纹的比较（1964） / 1

序 / 3

第一章 引言 / 12

第二章 名词的解释 / 14

第三章 花纹的制造方法与分类 / 20

第四章 觚形器花纹的分述 / 25

第五章 四组觚形器花纹的比较研究 / 42

第六章 结语 / 60

### 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青铜爵形器的形制、花纹与 铭文（1966） / 87

序 / 89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 92

第一章 引言 / 98

第二章 字体与形制 / 100

第三章 花纹 / 113

第四章 四组爵形器的比较研究 / 119

第五章 爵形器上的铭文及其所引起的问题 / 130

附录 觚爵两形铜器铭文考释 / 136

第六章 结语 / 152

### 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青铜斝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68） / 213

序 / 215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 217

第一章 罍形器的形制 / 221

第二章 花纹 / 234

第三章 总论形制与花纹之关系 / 244

**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青铜鼎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70） / 281**

序 / 283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 285

第一章 名称与形制 / 290

附录 甲骨文中所见之“鼎”字及与鼎形器有关之字体 / 310

第二章 鼎形器的文饰 / 316

**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殷墟发掘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文饰之简述及概论（1972） / 365**

序 / 367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 368

第一章 简述 / 375

第二章 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与文饰之特征及其他有关问题 / 413

第三章 结论 / 434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1976） / 519**

# 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 花纹的比较（1964）\*

---

\* 本文系 1964 年台湾出版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之下篇。



## 序

王国维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sup>[1]</sup>他接着说，若干古代礼器各具有自己的名称，宋朝的学者因以名之；也有若干古器物虽刻铭辞，但铭辞中并无本名，宋朝人便依它的形制而定名，后来的人就沿用下去了。这篇报告所研究的一组青铜器，习惯地均称为“觚”，就属于没有自己名称的古器物。至于宋人为什么称呼这组器物为“觚”呢？在《博古图录·斝觚斗斛等总说》中，有一段议论：

……礼义修于后世之伪，法度立于至情之衰，故创一器则必有名。指一名则必有戒，异代因袭，不一而足。自三王以来，各名其一代之器。……皆所以示丁宁告戒之意，若曰斝，曰觚，曰斗……曰角之类是也。……侧弁之俄，屡舞傴傴，而继之以醉而不出，是谓伐德，然后知酒之败德有如此者；败德若是，安得而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sup>[2]</sup>

这一大段议论，若详加分析，实在没有可以帮助我们鉴别觚这一器物形制的任何说明。究竟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在所附的图录中寻找。在比《博古图录》稍早的《考古图》中，列举了两器图样，标名为觚。第一器名曰“亶甲觚”，原藏河南王氏，据说明得于邳郡亶甲城，但无铭识；第二器属于庐江李氏，只标名为“觚”，没有铭识，但所附的收藏家李氏的跋语，有下列几句话：“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圈足）容一爵，‘《礼图》所谓二升曰觚（出《韩诗外传》）’。”<sup>[3]</sup>这可以说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三《说觚》，《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初集卷三，第12页。

[2] 王黼等：《博古图录》卷第十五，第5页，本立堂藏版。

[3] 吕大临：《考古图》卷五，第13页，亦政堂藏版。

是宋人根据形制而定觚名的最早意见，两器的图像大概就是较晚的《博古图录》定为觚名的三十五器的根据<sup>[1]</sup>。照《博古图录》的分类，所列的三十五件觚，有十六件属于商朝，其余的十九件都是周朝的。

王国维说宋人定的名称“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的一类，包括了“觚”这一型的器物。但是在他的《宋代金文著录表》所列的二十件觚中，表中附录项下所列的两条意见甚可注意<sup>[2]</sup>。在“单彛从彝二”下，杂记附云：“此器实觚而无棱。”在最后的数行，根据《续考古图》所录的五件名“彝”的四件（父乙彝，伯丁彝，父辛彝，父己彝），杂记中注云：“实皆觚也。”据此我们可以晓得宋人传下来的觚这一类的器名，有四分之一并未确定。所以王国维说的“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这句话，并不证明这一型器物的名称已经有了划一的标准。

为古器物定名，确实是一件需要细心思考的工作。古人为器物命名的根据，同今人一样，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似乎完全是依器物的功能作的选择，如《博古图录》所说的“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这一类的话究竟是后人的附会，还是原来的意思，尚无人加以考订，但问题的核心为这种功能是否与某种形制有固定的连系？换言之，要表示“戒其孤”的意思，是否只有某一种形制才能胜任？《博古图录》所载的三十五器，结构虽大致类似，就其外表的形制与文饰说，却有很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凡是翻阅这些图录的人便可一望而知。最令人发生疑问的是下面所引“周素觚”的说明：

凡觚之形，必为觚棱状，或饰以山形，以至作黄目雷纹种种之异。然是器则自纯缘而下，通体皆纯素，足间两旁又有窍，略相通贯，莫知其何所用也。<sup>[3]</sup>

[1] 《博古图录》卷第十五，第22—56页。

[2] 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第28页，《王忠愍公遗书》外编。

[3] 《博古图录》卷第十五，第56页。

这几句话，可以说等于否决了总说中的若干议论。因为既不知道它的用处，“戒其孤”的说法当然就发生摇动了。不过，这些文字上的游戏是不值得追求的。

研究古器物学命名的问题，也就等于为每一类型器物的历史作一番考订。这一考订的工作应该以实物为主体，寻求它们所具的功能及它们形制的演变。但是做这一件事情，我们的出发点虽说是以发掘的资料为主，同时也应该藉此把著录中的资料加一番界说及清理。关于史前的部分，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为没有文献材料作比较；到历史期间，这类困难减少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发生了。我所说的新的问题，很多牵涉古器物的名称部分。很侥幸地我们已经有一些整理完善的成绩可资凭藉；不过也有一些未完的工作，尚需现代的学人努力。譬如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批资料，即觚形器这批资料，虽经宋人加了初步的鉴定，但是地下的发现就引起了新问题。仅就名称这方面说，我们应该解决的至少有两种：（1）名字与形制的关系；（2）形制与功能的关系。若是就实物作出发点看这些问题，自然是形制方面比较容易说明。但是器物的形制不但有它的区域差异，也有时间上的演变。这两种不同的因素所引起的形制演变，表现在实物上的可以有大量的偏差，产生出很多的变种，形制差异的变种可能具有同一名称，也可能有不同的名称。至于功能则更难说了。上引《博古图录》所说的“戒其孤”的意思，在发现的新材料中，固难加以证实，亦不能加以否定。不过现在材料的发现，也供给了我们对于这一类器物若干先古器物学家所没有的新认识——如它们被放置在地下的原在情形。由这情形推测它的功能，我们可以作一种比较确切的判断。我们现在知道，觚这类器物在三千年前埋藏于地下时，总是与我们假定为爵的这类器物相伴在一起的。田野考古发现的这类事实已经累积到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其中不但包括青铜质的觚形器与爵形器，并且伸展到陶质的这两种类型，它们经常是相随在一起的。1948年，我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一文内，曾把觚形器与爵形器的联系，就出土的材料，用一个表详细排列出来。并说：



觚形器与爵形器的普遍存在,并成了一对分不开的伙伴。这一结合遵守一种极严格的匹配律:有一“觚”必有一“爵”,有二“爵”必有二“觚”。M331的三件觚形器,虽只有一件三足的爵形器相伴,却另有两件四足的爵形器作陪,故算起来,仍是照一一相随的例。同时这也可以证明,在功能方面,四足爵与三足爵大概没有分别。〔1〕

九年后,石璋如先生把我上说的话加了更多坚强的证据。他说:“觚与爵是一套酒器,在安阳殷代的完整墓葬中,有觚必有爵,有爵必有觚,两者似有不可分离的现象。到了周初也是如此。”〔2〕同时石璋如先生在同一文中,又作了一个有关的并且有趣的统计。他发现在传世的《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穀梁》、《孟子》等七书中,都没有“觚”字出现;十三经中,只有《仪礼》、《周礼》、《尔雅》和《论语》说到“觚”字。《论语》上说到觚的虽有四次,却只有一句话,即:“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的这句话所引起的问题,大概就是《博古图录》在周素觚的说明中怀疑的根据。由地下的材料,我们还得到另外一点认识,就是:觚形器在结构上有一大段过去的历史,必须追溯到史前时代的陶器身上;在历史期间,用青铜制造的这类器物,只代表它全部生命的一段;单就这一段历史说,也具有若干外形的变化。因为它的体形虽保持一固定的轮廓,如容庚所说的——“其形如圆柱,腹微鼓,足微侈,而大张其口”〔3〕——但是附在器外表的文饰,呈现了很大的变化,这类的演变可以说为觚形器的研究保存了一批丰富的资料。体型本身的变化,也是不拘于一格的。由这些发现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想到先前经学家认定为“觚”的这类器物,很显然地只限于具有棱脊的标本。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一类的

〔1〕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第79—80页,1948年。

〔2〕石璋如:《儒家经典中所见的觚与爵》,《学术季刊》第五卷第四期,第5—33页,1957年6月。

〔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401页,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41年3月。